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吴 忠 民

用“近代化”指称中国“现代化”是否准确？作者提出了异议，并从现代化模式、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应该以“中国早期现代化”取代“中国近代化”这一概念。作者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模式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低度发展，其具体特征是：意向性的追求甚于实际性的建设；明显的二元结构；过多的冲突的存在；缺乏平稳性，摇摆度过大。

作者：吴忠民，男，1959年生，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内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所使用的“近代化”这一概念并不准确。

本来，“近代化”与“现代化”均是指以大工业为发端的、以一个个民族实体为其载体的整个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正因为如此，所以英语中的现代化同近代化均用“Modernization”表示，日语中的“现代化”与“近代化”这两个名词也是表示同一概念。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如李达、胡适、何干之、钱穆、蒋廷黻等人也常常将现代化与近代化这两个名词交替使用。只是从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近几年，国内学者尽管没有明确点出，却开始隐约地将现代化与近代化分离开来，赋予近代化某些特指的涵义，使之实际上已成为与“现代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并认为中国近代化是指五四运动之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

如此使用“近代化”这一概念，尽管包含着不少合理之处，但严格来讲，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准确的概念，其中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这一概念侧重时间的意义，而没有侧重过程的意义。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不但包括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而且还包括工业社会继续完善的过程。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已经结束了现代化过程。而前述“近代化”概念则仅仅截取了这一历史过程的某个时间片断，将之独立出来并予以夸大。若按此理推论，如今我国属于当代史的范围之内，已走过了近代史、现代史的具体历史阶段，因此，我国不但早已实现了“近代化”，而且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甚至正在实现“超现代化”亦即“当代化”了。其二，这一概念并没能同现代化概念区分开来。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工业化，而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也是工业化，两者实指一事情。其三，国内一些学者所使用的“近代化”这一概念显然是指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但是，现代化概念也并不排斥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后面将讨论这一问题)。从理论依据上看，这一概念之所以没同现代化概念区别开来，是因为并不存在着一个与“现代性”(即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属性)有所不同的“近代化”，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了。

人们有时还容易将现代化与现代化模式这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混为一谈。这种作法，不仅妨碍了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观察，也妨碍了人们对于现代化模式的准确理解，因此，极有可

能进一步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学术分歧。

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过程，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与民族进入这一过程是必然的，而且这一过程将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与以往的历史过程相比，现代化具有着自己特有的历史特征（或称历史品质），即：社会化的大生产；世界范围内联系的日益加强；社会的急剧变革与发展；世俗化；理性化；民主化，等等。就此意义而言，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与民族相互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即：在现代化内容方面是相似的。

“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还不是同一个概念。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具体的现代化形态，是一般的现代化内容与民族传统、历史基础等成分的有机构成，而不仅仅是现代化的一般内容。

就社会制度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既可以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也可以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同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中的某一方相联，而排斥另外一方。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发端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而资本主义并非发端于工业革命，它是发端于十五世纪、十六世纪之交的新航路的开辟与文艺复兴，并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得以正式确立。现代化则是发端于工业革命。“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把工业中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即最高阶段叫做大机器工业（工厂工业）。这个阶段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生产中使用机器体系”^①，亦即工业化。可见，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并非一回事。整个十九世纪，现代化无疑只有一个模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到了二十世纪初的十月革命以后，现代化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可见，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可以同现代化结合起来，形成为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是并存的。

此外，现代化并非就是西方化。不同区域内的民族传统，对于形成一定的现代化模式，也有着重大的影响。那种把“凡属重要的历史变化”，都“狭隘地界说为西方自身所经历过的近代化进程（或各种进程的组）”，^②从而进一步断定，“现代的一项主要特征是：源自西欧的现代制度，传播世界”；^③“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向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④等的认识，是有其历史片面性的。

关于“现代化”的“西方化”观点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同现代化早期阶段的特点相吻合。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现代化本身对于民族传统的宽容量最小。当时现代化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人们凭借或准备凭借大工业的物质力量去彻底改造已有的这个世界，况且，在西方，由于现代化首先产生于此，再加上除西方以外的各个民族的文化又是如此之落后，于是人们心理观念上便出现了一种西方中心论。在工业至上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人们对于本民族的传统尤其是对于别的民族的传统采取了一种强力改变或是摧毁的态度，其他国家的民族传统被压抑、被歪曲，或者是随着自己弱小民族的灭亡而消失。“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总之，民族传统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411页。

②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出版，第133页。

③ 威尔纳编：《现代化》，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3页。

④ 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出版，第3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在当时被作为一种纯属落后的东西被摒弃于“先进”社会之外。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世界上出现了不少非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如苏联的现代化模式、日本的现代化模式等等。时至今日，人们对于现代化模式的认识愈益加深，逐渐认识到，现代化不是属于某个区域的“专利”。正如首先出现在东方的封建制度并不就是东方所特有的东西一样，首先出现在西方的现代化也并不就是西方特有的产物。现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带有普遍性；而西方化则是现代化在西方的具体表现，是若干现代化模式中的一种，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现代化与西方化有相通之处，但绝不是一回事。

历史基础对于现代化模式的确定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历史基础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既定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历史背景、历史条件等概念有些相近。但历史基础与历史背景相比较，又略有差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历史基础这一概念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言，更强调一种“参与性”和“介入性”，因而更具有一种主动的色彩。历史基础是多样化现代化模式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同以往的历史过程不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世界范围的广泛联系。当现代化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出现之后，将会迅速对别的国家与民族产生巨大的而且是直接的影响，而别的国家与民族则不得不改变以往的那种在封闭圈子里便可以生存与发展的局面。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未曾出现的新情形：后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似乎是突然改变了自己本来的正常的发展轨道，否则便无法生存。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这些国家与民族必须走现代化这条道路，另一方面，后来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自的历史基础极不相同。对于这些国家与民族来说，现代化势在必行，而历史又无法超越。因此，历史基础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便造成了这种国家与民族日后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既然历史上并不存在着一个与现代化有所不同的“近代化”历史过程，因此，应该用“中国早期现代化”这一概念来取代“中国近代化”这一概念。

二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指始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化进程。

只有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放到近代中国演进的基本脉络中加以考察，才能有效地说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它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的位置。

近代中国演进的基本脉络是：现代化的低度发展与民族运动的日趋高涨这两个方面同步展开。

“现代化的低度发展”这一命题的第一层含义是指，除了外国对于中国大规模军事入侵的短暂时期（如日本侵略）之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一直没有中断，总的说来是呈持续递进的状态。以新增民族资本为例，1872年为36000元，1880年为27972元，1885年为449580元，1890年为1204894元，1895年为4219428元，1900年为3097976元，1905年为14813391元，1910年为4944740元。以新建民族厂矿为例，1872年为1个，1880年为1个，1885年为2个，1890年为7个，1895年为17个，1900年为10个，1905年为54个，1910年为10个。^①“现代化低度发展”的第二层含义是就现代化的进度而言非常缓慢，中国的经济势力日益落于别的现代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第93页。

化国家之后。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中,1860年,中国占8.6%,1880年占2.8%,1900年占1.7%。从以人口计算的工业水平的指数来看,1880年,中国为4,1900年为3。^①“现代化低度发展”的第三层含义是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内容而言,很不规则,带有浓厚的畸形化的色彩。多种因素决定了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根本不会产生企业竞相增长和生产合理化等现象”。^②中国在八十多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相对来说,轻工业过重,重工业过轻;况且,还有这样一种情形:“成千上万的企业仍然采用主要是依靠手工而不是资本的技术”。^③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低度发展”的情形,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一系列特殊的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所决定。再进一步看,“内部决定的程度是由下述一系列因素决定的:内部结构机制的发展水平,纷繁多样性的水平,信息容量等等。客体的系统越复杂,内部因素的作用所获得的意义就越大,而且从某个时候起它们可能成为系统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外部因素对系统的影响越来越成为间接的,如果它们原先是占优势的原因,那么现在它们的作用基本上可归结为条件和起动装置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只是发动、加强或阻碍内部过程。总的说来,这种过程表现为具体系统的自己运动,同时外部环境也对这些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④

导致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低度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互交织,极为复杂。初始,以外部因素为强制力,直接启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继之,由于内生力的勃发,故而内因逐渐成为影响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当然,外部因素仍在发生着影响)。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并非始自中国社会的自身体内,而是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密不可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强行改变了中国正常的行进轨道,启动了现代化的发端,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持续展开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有利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一方面,它为脱离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早期现代化的建设保持着一种日益严重的压力。“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⑤因此,为了本民族的存在,中国人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建设,“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⑥另一方面,它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不可能找到先进的参照系,以供现代化建设之用;当时,这个参照物只能是来自西方国家,由西方国家不自觉地给予提供。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启动中国现代化发端的同时,又给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巨大的、几乎是全面的障碍。“即使强大的压力没有达到建立殖民地的目的,但如治外法权和关税自治之类的众多限制则强加于这些主权国家。”^⑦外国人直接把持着海关,实行低税率,致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失去了必要的保护,根本无法同外国商品竞争。外国人控制着中国

① 保罗·肯尼迪:《中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出版,第181、182页。

② Charles k Wilber等:《依赖的模式:所得分配与低度发展》;载肖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印行,第231页。

③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1月中译本,第424页。

④ φ·φ·维亚凯列夫主编:《客观辩证法》,东方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第28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⑥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篇》。

⑦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第294页。

的金融业，使中国民族工业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1883年，完全由上海外国银行一手造成的金融风潮，致使“上海七十八家钱庄关闭了六十八家，南北市行号因受牵累而停业者达三、四百家”。^①巨额的战争赔款，使中国失掉了大量的、对于现代化来说是至为重要的资金，仅《马关条约》就规定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辛丑条约规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而在1894年，中国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总额仅为3560万元，就是到了1913年，中国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总额也只有25000万元。^②外国资本家还直接在华投资工业，压制中国的早期现代化。1895—1913年，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工业543万元，民族资本则只有478万元。^③此外，外国侵略者还在中国投资矿山、修建铁路、大量倾销商品等等。这些，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不能想象，在如此不利的情形下，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能顺利展开。

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一些有助于现代化展开的因素。其一，封建统治阶级力量的削弱与分化。经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打击，清廷统治力量急剧削弱。对于一些性质上迥异于封建主义的新事物，清廷愈来愈缺乏足够的力量予以消除，这就在客观上为现代化进程的开展提供了某些缝隙。更为重要的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愈益严重的分化现象。一些能够反映新时代倾向的官员如洋务派、部分维新派，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形成。这些有着不同开明程度的官员对于早期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曾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其二，现代化事物本身的存在。现代化的产生，虽不是直接源自中国社会内部，然而，现代化一旦产生，便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性格及发展规律，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成份。因此，中国早期现代化本身便可以在一定程度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而逐渐展开。其三，某种新环境的出现。自洋务运动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由此而形成的社会、文化新环境，以及新式人材接续不断地产生，不仅有益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展开，而且也为之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量。

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同时又存在着严重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因素。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现代化的直接压抑与摧残。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廷已与外国侵略势力结合在一起，不再是民族利益的维护者。清廷之后的北洋军阀仍步清廷之后尘，同外国势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失去了国家保护这一重要屏障，处在更加不利的境地。中国早期现代化不仅缺乏有效的国家保护，而且还直接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盘剥。这主要表现在严重的苛捐杂税方面。如中国矿业产主，要缴纳如是税款：海关税、常关税、厘金、矿产税、矿区税、地税、杂税，数额巨大。有记载，“甬江（宁波）和丰纱厂，自开办以来，出纱较纯，颇足抵制洋货。惟购运制纱进口，除完缴正税外，又须报纳厘捐，未免本重价昂”。^④这种严重的盘剥，无疑使中国民族企业所获利润甚少。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现代工业无法进行有效的扩大再生产。其二，资本严重稀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民众本来就没有多少资金转换为资本，再加上近代中国一直是动荡不安，致使广大民众更加赤贫化。1934—1935年，中国农村各类农户中负债户的百分率平均为71%。^⑤因此，近代中国的资本形成陷入两个难解的恶性循环之中，即：在供给方面是，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在需求方面是，低收入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81页。

②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出版，第414页。

③ 同上，第411页。

④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中华书局出版，第1130、1143页。

⑤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第342页。

——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严重的资本稀缺，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无法顺利展开的重要原因。其三，落后的文化基础。在近代中国，落后的封建文化占据着压倒优势。因此，对于现代化进程来说属基本杠杆的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的文化、现代的观念，很难以在近代中国社会扎根，更谈不上顺利发展了。

总之，通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有利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虽然很弱，但始终没有消失；而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来说是阻碍性的内外部因素也始终存在着。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模式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低度发展。**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逐渐展开，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们愈来愈要求摆脱现代化的低度发展局面，于是，这就涉及到中国近代史中的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同步出现的重要历史课题——民族运动的日趋高涨，因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①

“民族运动的日趋高涨”这一命题的含义是，投入民族运动中的人数愈来愈多，声势愈来愈大，造成的影响愈来愈广泛、深刻；而且，民族运动本身的“现代”意义愈来愈浓重、鲜明，与旧时民族正义战争的分离愈益加大，直至完全分离。促成近代中国民族运动日趋高涨的因素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国侵略的不断加剧一类的外部因素，一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相较而言，后者为最主要的因素。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逐渐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有效的民族动员。对于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大的民族而言，要想获得民族独立，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就是这个民族必须进行最为广泛的民族动员，唯有如此，方可形成一种足够的民族力量，以彻底摆脱外国侵略者的控制。具体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民众动员来看，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是否有一个能够号召、组织民众的先进的社会力量。而这种先进的社会力量恰恰是在现代化低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洋务运动时期的现代化运动，产生了一股先进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促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民族动员。但由于这股力量人数太少，而主要限于上层，有着诸多的阶级局限性，因而由他们所发动的民族动员之程度十分有限。之后，又出现了维新派，进行了比前一时范围稍广的民族动员，但仍旧没有同民众直接接触，因而也不可能形成范围很广的民族动员；几乎在同一时期，农民开始走上民族独立的舞台，却因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引导，因而很快败下阵来。此后，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展开，资产阶级革命派得以形成，并扮演了领导民族动员的角色，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动员，但由于没能同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结合在一起，仍然归于失败。“五四”之后，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展开，中国无产阶级以一种特殊的形式，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无可争议的最先进的社会力量。只有这股力量才可能与近代中国民族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农民力量（虽然并不是先进的社会力量）联盟。“在中国和俄国，农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②“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③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最有效的民族动员，对于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产生了最广泛、最深远的影响，并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愈益具有了“现代”的意义，同传统的民族意识逐渐分离。对此，可作如是理解：其一，中国的现代民族意识逐渐得以形成。

①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8页。

②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出版，第368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7页。

早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林则徐、魏源等先进人士还没能充分认识到西方经济侵略与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主权所造成的危害，因而他们的民族意识还不能说是明确的，而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范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在不断的觉悟与深化。他们逐渐认识到了民族主权的具体意义，比如海关大权不能有外国人掌握，关税要自主，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要取消，有损于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应予以废除。人们在确立民族主体意识的同时，还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开放意识，认为一个民族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结束封闭的状态，将本民族置于世界民族之林，引进或借鉴别的民族的先进事物。其二，人们逐渐确立起建立独立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共识：富强的国家就是现代化的国家。离开了现代化，中国就不能摆脱贫困，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获得独立。其三，人们将反帝反封建作为实现民族独立的基本途径。人们在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两个阻碍现代化正常发展的主要因素：一个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个是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因而中国人民愈来愈明确地将斗争矛头直指这两个主要敌人，将反帝反封建作为实现民族独立，从而摆脱现代化发展的低度性的基本途径。

既如上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促成了民族动员并使民族运动具有了“现代”的意义，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早期现代化低度发展的具体过程，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日趋高涨。反过来看，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运动起了直接抵制外国侵略的作用，确保了我国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并且，对于封建势力的打击一次甚于一次，这些，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得以持续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民族运动引发了人们从事早期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不断地造成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势”。每当一次民族运动高潮掀起之时，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总能取得一些明显的进展。1894—1898年期间，伴随着戊戌维新爱国运动的高涨，现代民族工业陡然扩展。1893年，新形成的民族资本为36万元，1894年则为318万元，1895年为422万元，1897年为592万元，1898年为388万元。1905年，随着抵制美货、收回利权民族运动的兴起，现代民族工业也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1904年，新形成的民族资本为522万元，1905年则为1481万元，1906年为2128万元，1907年为1457万元，1908年为2253万元。^①

总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低度发展与民族运动日趋高涨相互影响、同步展开的历史。当两者同步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会使中国跃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民族获得了独立，现代化结束了“低度”发展的局面，正常健康的发展成为可能。

三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这一基本特征，以及低度发展与民族运动的日趋高涨相互联系这一情形，规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如下一些具体特征：**

第一，意向性的追求基于实际性的建设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意向性的追求同实际性的建设之间形成一种极为明显的反差。1894年，中国民族产业资本总量为710万元；1913年为16200万元。^②不消说，这在整

^①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第93页。

^② 参见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出版，第414页。

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很小的，因而很难对整个国民经济发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其本身的现代化程度也是不充分的；民族企业带有较浓厚的封建色彩，如不少现代民族工业用“官利”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和稳定资金。与这种实际建设状况形成强烈对照，中国先进人士对于现代化追求的程度相对说来则是很高的。维新派提出了以建立系统的现代工商业、议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社会的蓝图。孙中山等革命派更是完整地构划出中国现代化具体发展战略的蓝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代化的蓝图对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曾发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差，直接的原因是民族运动日趋高涨。民族运动，对于直接投身于其中的先进人士的影响是巨大的。试想一下，近代中国给人们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吾中国四万万，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①这种急切的焦虑感，必然地会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激情。在民族激情的影响之下，一批批先进人士成为整个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阶级基础的不成熟性，从而创造出一个个看上去高于实际现代化进程的救国救民的蓝图。而在另一方面，受种种内外因素的制约，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却又必然地呈低度化发展的状态。因此，这两个方面之间不可能不出现一种明显的反差。

尽管对于现代化的意向性的追求带有浓厚的情绪化色彩，但在当时，确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定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对于民族动员所发生的日益强大的号召力量。不过，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一旦民族获得了独立，现代化的正常发展已成为可能之事的时候，这种带有情绪化色彩的意向性的追求仍有可能保持着巨大的惯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绪在通常情况和日常生活关系中，惯于把共同体看作实体性的基础和目的。”^②因此，这时如若不及时地将全副精力转入现代化建设，并按照现代化本身的规律来推进现代化，那么，就极易诱发现代化进程的虚脱和盲动两种弊端，从而延缓了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第二，明显的二元结构

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之特征。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尤其是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遇到二元性的社会现象，即：性质迥然相异的两种事物在既定领域中并存。这种现象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尤为明显、突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低度发展，使得中国现代化本身缺乏一种足够的扩散力和渗透力，因而对于旧事物的破坏力明显不足；而且，近代中国日趋高涨的民族运动是侧重于为现代化的正常发展确立一种必要的民族独立的前提，而并非侧重直接确立现代化的内容。这种情况，便直接造成了影响全局的二元性结构问题：“在持续不断的社会变迁的情况下，不同的社会部门，尤其是已经解体的传统部门和同样不平衡而又尚未整合的现代部门的并存。”^③

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二元性结构首先表现为相对先进的现代工业与落后的旧式农业的对应。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并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还是凭借着资

① 《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四集，第407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67页。

③ 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01页。

金和技术上的优势压倒了传统手工业。在农业部门，情形则大不相同。近代中国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从总体上来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它也受到了来自几个方面的冲击。近代“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上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中国农村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这种剥削的范围和封建剥削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生产力，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日趋破坏，这种破坏，表现于：一、灾荒的频承……二、每亩产率的降低……三、荒瘠土地的增加……。”^①落后的农业，为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设下了严重的障碍：限制了民族工业的国内市场，在相对程度上使得资本的形成为困难之事；使城市工业缺乏必要的城市人口的商品粮。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二元性结构还表现在思想观念方面。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中先进的思想观念发展很快，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先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很快就发展到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又很快发展到革命派的三民主义，接着又出现五四人的“科学与民主”，最后则是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②另一方面，则是旧思想的根深蒂固。旧的思想观念不仅仅是封建统治集团所一直捍卫与奉行的，同时也是大多数民众所普遍接受的。

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二元结构是一种障碍性因素，它不但对于现代化的推进起着一种阻碍性的作用，而且还有可能对正常的现代化内容给予歪曲。更有甚者，它一旦形成，便有着极大的惯性，即便是早期现代化过程已告结束，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而这种二元性结构仍“是长期的，不仅仅是一种过渡。它并不是一种暂时现象，优越成分和恶劣成分的差距不会一下子消失。”^③如何才能缩小这种二元性构成之间的差距，不使之继续扩大？如何才能将之不利影响限制到最低限度？如何才能最终消除二元性结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后人有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前提。

第三，过多的冲突的存在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过程有一个很不同于早发展国家（如英、法等国）和一般殖民地国家之处在于，存在着过多的冲突。这些冲突有的直接显露出来，有的则程度不同地隐藏起来。

这些冲突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为民族性的冲突，这主要是指中华民族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冲突。另一种类型的冲突为新旧因素之间的冲突，即：属于“现代”范畴之内的新事物同旧的、落后的事物之间的冲突。相较而言，前一种类型的冲突表现得很激烈、很充分，而后一种类型冲突中的大部分也表现得很激烈、很充分，但却有一部分表现得却是很曲折、很隐蔽、很不充分。

为什么会出现一部分新旧冲突暂时隐蔽起来的情形？在近代中国，尽管存在着多种冲突，但是，民族性的冲突占有压倒优势，“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④“西方政策的目的在于不断增强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⑤在西方侵略者咄咄逼人的威胁之下，“要使民族能够完整地生存下去，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遵

① 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载高平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45、253页。

②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出版，第9页。

③ 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17页。

④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4页。

⑤ Paul A·Cohen and John E·Schrecker：《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Published b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68

循传统，维持认同和整合以面对无力感、人口减少和崩溃的威胁。”^①而在当时，传统在相当程度上是同旧的时代内容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持传统也就不排斥守旧。一部分落后人士在拒绝新事物的同时，更看重抵制外国的侵略，因而特别执着于传统。况且，民族传统中还保留了不少具有合理价值的成分，这就有可能使先进的人们也倾向于维护传统，以取得一种认同的效应。这样，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力量便有可能同一部分旧的、落后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某种程度的联手，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在这种情形下，一部分新旧冲突便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得以缓和、得以隐蔽下来。

上述某些潜在的新旧冲突只是暂时隐蔽，并非消除。这对当时或以后的现代化进程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 响。“民族主义，在为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社会中，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力量，一旦国家获得成功，它很容易变成保守……的力量。”^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主义内部，旧的、落后的因素对于新的因素极有可能起着一种消蚀或使之走样的作用。新旧因素在特定时期联盟，使得双方不可能不相互发生影响。为了有效的联盟，两者极有可能同对方在某些问题上达到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有时甚至都意识不到。这样，从新的因素一方来看，妥协便意味着自身的“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弱。另外，某些必要的、落后的、旧的因素的保留，对于其他应尽快消除的旧因素起着一定的支撑作用。因为，旧的因素都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其性质皆与新的事物格格不入。重要的是，这些落后的旧因素具有一定的有机关联性，即：各种旧因素之间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因此，一旦别的旧因素受到冲击，那么，人们不得不保留的那部分旧因素便会极力支撑受冲击的旧因素，帮助它恢复原态。于是，现代化的进程将因此而更不顺利。

第四，缺乏平稳性，摇摆度过大

同先发展国家（如英、法、美等）的现代化进程相比，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既不规则的，也不是积累性的。相反，它是不平稳的，有些阶段增长得特别快，接下去却又突然受到阻塞。”^③这一情况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很明显。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缓慢，但相对说来，有时却出现一种急速发展的状况。如一战期间至战后的7年间（1915—1921）是近代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现代工业投资突飞猛进，“常占各业总投资的60—70%。”^④不过类似的情形不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很快就会重新回到缓慢发展的轨道上去。

这种情形不仅仅是由于外国的直接经济侵略所造成的，也跟近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上述三个特点密相关联。既然是意向性的追求基于实际性的建设，既然是二元结构存在，既然是冲突点过多，那么，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然缺乏一种自身的有机递进性，就必然缺乏发展秩序的平稳性，从而呈现出一种起伏度过大、摇摆度过大的情形。

责任编辑：张宛丽

① 罗杰·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45页。

②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8页。

③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45页。

④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出版，第455页。